

市长看望赵本山不关“人民”什么事

权力、财富和社会声望之间,是不同的价值,各有其独立的价值,不能互相取代,不能互相交换。但赵本山备降事件说明,在一些地方,这些价值其实是高度一元的,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只要你占有了其中之一,就可以实现“通吃”。

>>头条评论

□本报评论员 张金岭

这两天,民航一家网站的消息被不少门户网站转载:赵本山的商务包机备降湖南常德机场,该市市长陈文浩“第一时间赶到机场”慰问。此事引起舆论关注,网友普遍对此质疑,认为市长此举实属不该。

在此事件中,有一个细节耐人寻味,那就是赵本山备降常德机场的消息,是怎么传到市长耳朵里的?按理说,飞机要来备降,只要给常德机场一个信息就够了,怎

么连什么人在飞机上都说得这么清楚?不但常德机场得到了这个“重要情报”,连市长也知道了,不知道是谁在什么情况下通知市长的,以及有何必要通知市长?

一架飞机要备降,机场工作就是做好准备保障安全,但因为是“赵本山的商务包机”,来的就不仅是包机,更重要的是赵本山,这个信息比飞机备降本身重要多了,要不然市长也不一定来。这就让人怀疑,在整个飞机备降的过程中,无论是航空方面的安排,还是常德地方官员的行动,都是围绕着“赵本山的包机”来的,果真如此的话,赵本山这个名字,事实

上就成了在中国的国土上畅行无阻的名片,这张名片上写着的,其实是一个“成功人士”无形的社会权力。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上,的确有一些人,他们只要有了足够高的地位,就没有走不通的路,不知道赵本山算不算其中的一个。市长看望赵本山,让人感到不舒服,触动了公众敏感的神经,甚至感到忧虑的,其实正是这一点。

在很多情形之下,世界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虽然是崎岖不平的,但对强者或精英人物来说世界不但“是平的”,而且可以一览无余,还可以随处享受到大大超越一般公民的尊重和荣耀,竞争

性的市场法则,无限制地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多数人体验挫败感的同时,强者时时刻刻都能体验到“高等华人”特有的尊严,市长机场看望赵本山,再一次产生了这样的社会效果。赵本山要来备降,常德机场除了考虑“做好了此次商务机的监护、免检”工作,竟然还考虑到了“礼遇”等工作,这真让人感到吃惊!常德市长“礼遇”赵本山,面对舆论的质疑,当地官方是用非常主流和严肃的语言来解释的:赵本山是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文化界领军人物,而常德市正在打造文化名城,市长前往慰问体现了

常德人民对全国人大代表的尊敬,对文化名人的敬重和对空乘人员、乘客的关心。这也就是说,金字塔底层的多数人,必须被迫向金字塔顶端的人莫名其妙地表达“尊敬”和“敬重”,这尤其令人愤恨。

有人说,生活模式和价值观念多元化了,说明我们社会进步了,比如权力、财富和社会声望之间,是不同的价值,各有其独立的价值,不能互相取代,不能互相交换。但赵本山备降事件说明,在一些地方,这些价值其实是高度一元的,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只要你占有了其中之一,就可以实现“通吃”。这种

不同价值之间的一元化状态,说明我们社会进步的速度,要比财富的积累速度慢得多。

市长不但去机场看望了赵本山,而且把此举解释为“体现了常德人民对全国人大代表的尊敬”,并把满面笑容的合影公之于众,这可见市长不仅觉得应该去看望,而且对此没有任何忌讳,但双方这种本质上资格和资本的对话,非得挟“人民”以自重,就太不着边际了。

市长到机场看望赵本山,这种“成功人士”处处受到不正常礼遇的现象,正是中国社会某种病症的反映,也是民众忧虑的地方。

>>众论

组织学生跪父母更像是“邀功”

5月4日,广东实验中学举办该校第一届青年礼——初二全体同学在操场上给父母下跪,并从父母手里接过了父母写给自己的家书。校长表示,青年礼源于一位普通学生的建议。老师和家长委员会认为,跪是中国的最高礼节,通过这种形式最容易让学生留下最深刻的人生印象。(5月5日人民网)

庆祝青年节学校搞一场青年礼,方式极多,有诸多更妥当的方式不选择地,该学校却别出心裁地选择“学生跪拜父母”的方式,在笔者看来更像是一场吸引眼球的“邀功”。其目的不过就是,让学生的每一个家长似乎可以

从子女的跪拜中找到孩子成长的“证据”,似乎通过一次青年礼上的“跪拜”,让家长他们可以相信这个学校的教育质量,在学校的教育之下看到孩子更“懂事”——仅此而已。

下跪的学生就一定“知书达理”、孝敬和理解父母吗?而且,即使是在一年一次的青年礼上跪一跪父母,这样的频率能对学生的内心道德起到多大的导向功能?还有,近乎“作秀”式的“勉强”下跪,平时根本“用不着”,又何来潜移默化之教育功能?所以,所谓的“跪拜礼”效果,校方自夸得再高,实际意义也不大。

(毕晓哲)

官员的“责任田”不是种地

重庆南岸区规定,从今年开始所有机关干部每人都要下乡种地,每年累计时间1个月。为不耽误正常工作,干部种地的时间多选择在周末。据悉,下乡种地情况会纳入年终考核。(5月5日《重庆晨报》)

机关干部高高在上不“沾地气”,久而久之,必然体验不了农民的艰辛,疏远与人民群众的距离。从这个角度说,官员亲自下地劳作,有利于接触基层,体验生活,和群众建立感情。笔者丝毫不怀疑官员租地种田的良好初衷,但这一做法如果作为一项硬性规定,恐怕值得商榷。机关干部从事的是公务活动,他们的职责是公共管

理和社会服务,而不是从事租地种田这样具体的工作。机关干部租地种田,如果是纯粹的个人业余爱好,应该鼓励提倡,但作为一项职能工作并纳入年终考核实为不妥。

其实,机关干部职责在于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让机关干部以躬耕垄亩,并非是密切群众的解决之道,也不是问题的关键。毋庸置疑,机关干部需要“责任田”,但这个“责任田”不一定是种地。如果能够经常深入基层,了解农民的生产生活困难,并采取措施保障农业生产,帮助农民增产增收,这样的职能定位肯定要比租地种田好得多。

(刘洪)

交警“登报道歉”之后还应有“下文分解”

5月3日,《长沙晚报》头版刊登长沙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芙蓉区交警大队的道歉信,对5月2日16时许行经芙蓉区晚报大道与东二环线交叉路口被堵的驾驶员和市民朋友们深表歉意:“作为长沙城市交通的管理者,此次拥堵我们排堵不力,责任不可推卸。”(5月5日《楚天都市报》)

交通拥堵,出行不畅,在全国都是一种顽疾。这既与交通硬件设施滞后等客观原因有关,也与部分车主交通意识淡薄,交通、城管等职能部门配合不力,现场处置不当等主观原因有关。过往那些长时间、大面积的堵车现

场,常见的“镜头”就是互相指责、推诿,明知是自己失职失误,也“死不认错”。

这次,长沙交警放下架子,拉下面子,敢挑担子,该出“口”时就出“口”,勇于向公众道歉,让人眼前一亮。不过,公众期待的最终最理想的结果,并非一“歉”了之,而是在“道歉”之后,深刻查找问题的原因,并据此制定解决方案,使问题得以从根本上解决,利益得以最大维护。如果“登报道歉”之后听不到令人满意的“下文分解”,那么,不论这样的道歉何其发自肺腑,也是“作秀”,得不到百姓发自内心的叫好。(高福生)

■本版投稿邮箱:zhangjinling@qlwb.com.cn

监督“三公”经费还是要靠同级人大

公共专栏

□郭松民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日前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推进财政预算公开工作,要求地方政府要比照中央财政的做法,公开“三公”经费(出国(境)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等。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天文数字的“三公”经费不透明,其中隐藏了大量的浪费和腐败,这已经是一种公开的秘密。一段时间以来,中央国家机关如科技部等,不仅率先公布“三公”经费,为各地方政府作出表率,这次国务院更明令地方政府向中央部门看齐,这就使得地方政府失去了拒不公开的任何借口。毫无疑问,这一举措对落实公众和舆论的监督权,对于防止腐败和浪费,都具有重要意义。

不过,在肯定这一举措的积极意义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一措施仍然是按照传统的上级监督下级的路子展开的。虽然地方政府迫于上级的压力,可能不得不对“三公”经费等进行公开,但这种公开是不是符合实际的“三公”消费情况?有没有隐瞒?公开的是不是假账等,都需要进一步追踪。国务院面对众多地方政府,无论从需要还是可能的角度来说,都无法一一核实。

其实,对一个地方政府的“三公”消费情况,最有积极性、最有能力进行监督的,还是当地公众。比如对一个城市的市民来说,每年财政支出的“盘子”就那么大,如果用于“三公”消费的多了,用于改善民生,提供其他公共产品的部分,肯定就少了。因此,对于这个城市的市民和人大代表们来说,公开“三公”经费与他们的切身利益密

切相关,所以他们也无疑最愿意对此行使监督权。

此外,依靠当地的民众和人大对政府的“三公”经费进行监督,还有一个明显的好处是,他们最了解情况,地方官员如果想在这些方面做手脚,欺骗上级容易,欺骗他们就很难。

监督必须要有途径。实际上,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框架内,监督的架构和途径是现成的。一方面,根据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各地方政府都是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人大代表自然拥有监督同级政府的权利;另一方面,目前我国的《代表法》《人大组织法》《监督法》等法律,都明确授予了人大质询权,去年两会时,吴邦国委员长还在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明确表示“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将会使用询问、质询等监督方式”。

而从法律的角度看,用“质询”的方式监督“三公”经费,将会比简单地要求公布要有效得多。“质询”的刚性和严厉性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被质询者不得回避必须作出回答答复,这正如宪法要求的“受质询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二是对于被质询者的答复,质询者有权再评价,若不满意,被质询者需要再作答复;三是“质询”的议题,除了少数涉及国家机密的内容外,通常是要通过现代传媒,向全社会公开,甚至直播,实际上等于全体公众一起质询。可以肯定的是,在这样的监督机制下,官员要是再想玩“猫腻”,也就难上加难了。

这些年来,每当在谈到很多社会弊病长期无法解决时,舆论往往会将原因归结为机制不健全。其实很多机制是存在的,只不过是“沉睡”当中,我们需要通过某种契机唤醒它——在我看来,对“三公”经费进行监督,就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我们为何不愿花钱

>>言论观察

5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署名评论文章,指出群众为何总是不花钱?有消费习惯、消费环境的因素,但说到底还是老问题——缺少花钱的“底气”,没的花、不敢花。

文章说,花不花钱,先要看钱包做不做主。单看统计数据,过去几年,劳动者工资远比CPI“跑得快”,但仔细分析,多年来统计部门监测的主要是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工资,如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国企职工等。直到2010年,我国才首次发布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工资状况,这部分劳动者平均工资

2009年为18199元,一个月约为1500元,仅相当于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工资的55.6%,相当于国有企业职工平均工资的51.9%。

花不花钱,还要看老百姓未来的支出风险有多大。从幼儿园起就可能要交赞助费、上指定的培训班,大学收费一年年看涨,有机构测算,目前我国中等城市居民培养一个大学生至少要付出20万元的成本,谁家能不攒点钱?工作不好找、稳定且收入不错的工作更难找,一想到孩子将来可能要无奈“啃老”,工薪阶层的父母,谁敢敞开来花钱?看病最让人害怕,就算有医保,万一家里有人得了大病,还是吃不消。“人生

莫受老来贫”,某经济学家“没有500万元存款无法养老”的标准不敢奢望,但谁都希望退休后生活质量不要有明显下降,较高的通胀预期和不够“给力”的保障水平,让普通人只能选择尽可能地多存钱。至于房子,虽然在统计上不计入消费范畴,却实实在在地占去收入的一大块、挤压着消费……

文章认为,刺激消费是从老百姓那里“取”,那么解决这些制约消费的根本性问题就要“予”,实实在在地通过增加民生投入提高收入水平、化解后顾之忧。否则,只靠以旧换新、家电下乡等刺激性政策,恐怕效果有限,消费也很难真正走出低谷。